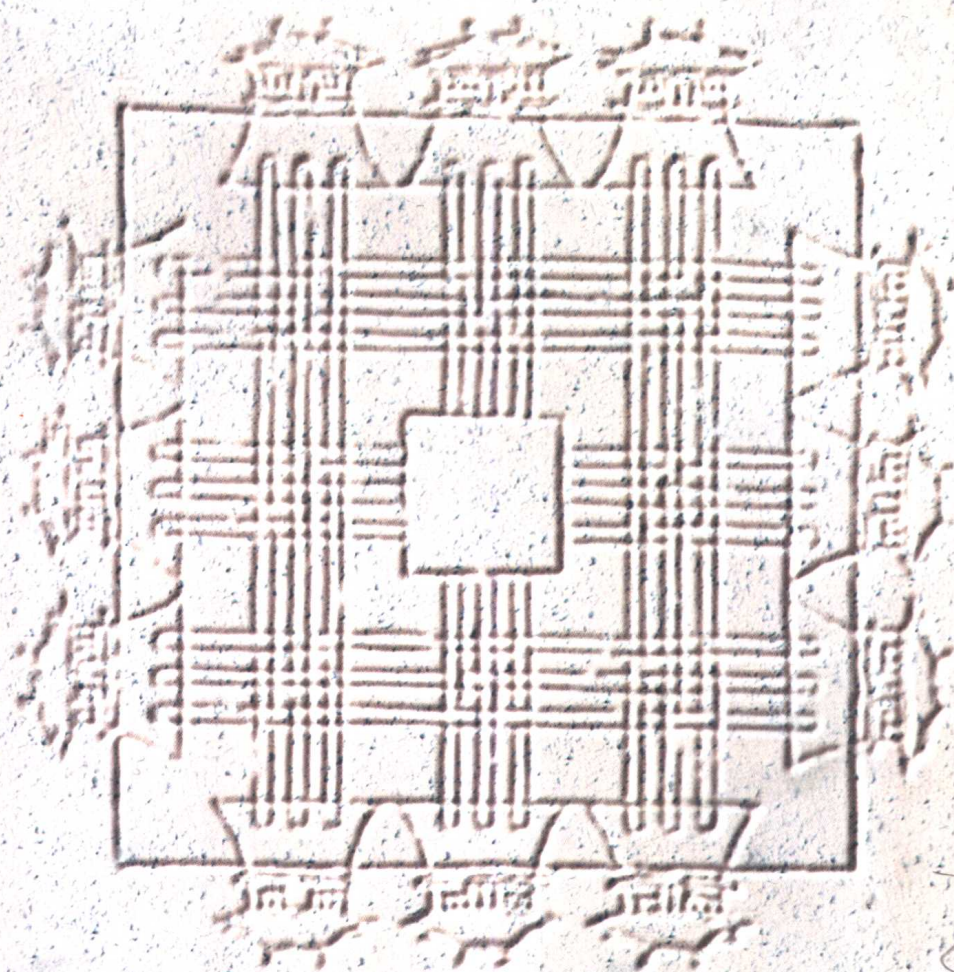


王世仁建筑历史理论文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王世仁建筑历史理论文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世仁建筑历史理论文集/王世仁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7

ISBN 7-112-04441-3

I. 王… II. 王… III. ①建筑史-文集②建筑学-理论-文集 IV. TU-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563 号

书名题字: 于得祥

责任编辑: 于志公

王世仁建筑历史理论文集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32³/₄ 插页: 12 字数: 1036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一版 200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850 册 定价: 88.00 元

ISBN 7-112-04441-3

TU·3946(991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王世仁，原籍山西省大同市，1934年出生。195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曾作为梁思成、刘敦桢教授助手编写中国古代、近代建筑史。1966~1976年在广西桂林从事建筑设计。1976~1980年在河北承德文物局任工程师，从事文物建筑修复设计。1980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哲学所副研究员，从事建筑美学研究。1984年后任北京市文物局副总工程师、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研究员、一级注册建筑师，1995年后受聘为首席研究员，从事文物建筑保护规划设计。曾发表建筑历史、理论，文物建筑保护专著及论文百余篇，主持修复文物建筑及设计仿古建筑十余项。现受聘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委员，首都规划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1997年被俄罗斯建筑遗产科学院选举为外籍院士。

责任编辑：于志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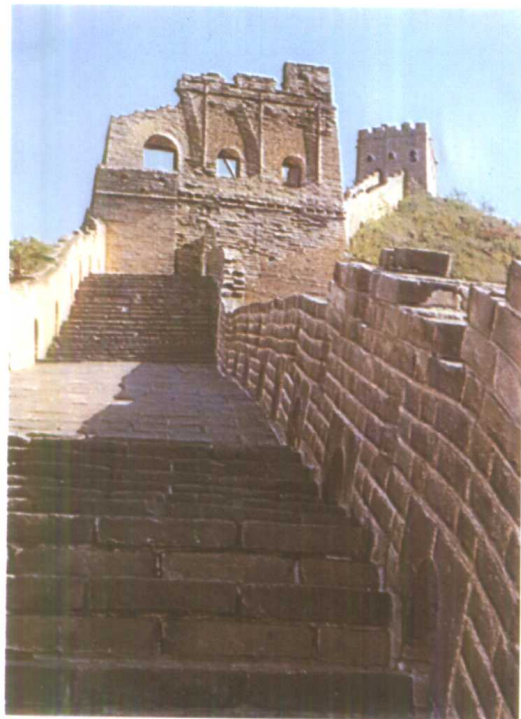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修复
(陈克寅摄影)



北京司马台长城整修
(韦然摄影)



北京湖广会馆整修再利用
(韦然摄影)



北京司马台长城整修
(韦然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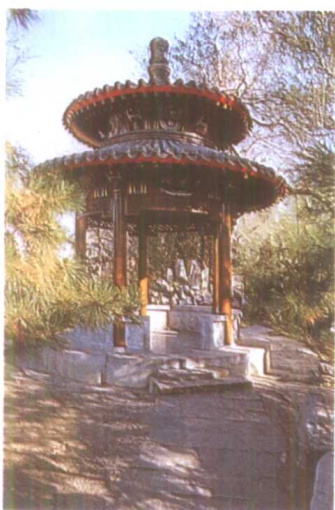


北京湖广会馆戏楼内部
(赵德春摄影)

设计作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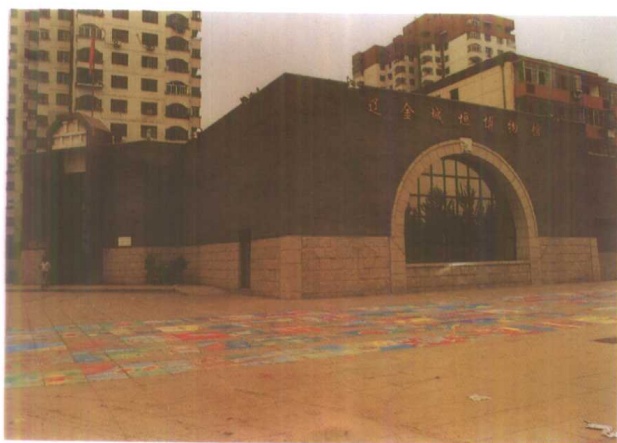


北京房山董家林西周遗址博物馆



北京宋庆龄故居瑰宝亭
(韦然摄影)

设计作品(二)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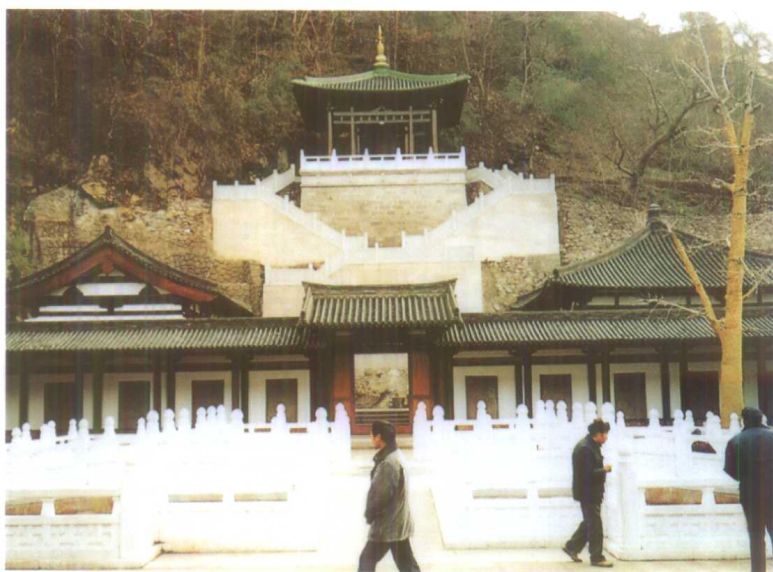


北京西滨河路蓟城纪念柱
(韦然摄影)

设计作品(三)



浙江临海龙兴寺仿唐建筑 大雄宝殿



浙江临海龙兴寺仿唐建筑 钟楼



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九亭园仿清建筑
(韦然摄影)



北京天桥乐茶园仿民初建筑 入口改造
(赵德春摄影)

谨以此书纪念

恩师梁思成教授诞辰 100 周年

前言

1956年春季,清华大学建筑系和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合组建筑历史理论研究室,梁思成任主任,1958年初并入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所,改称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后改为所),梁先生仍任所长。我自1956年春季在清华建筑系毕业后即进入该室工作,至1965年底“设计革命化”被“革”出北京后即离开这个单位;1978年后恢复研究所,人员虽有变更,但牌子还是老的。应该说,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建筑历史理论研究所,到今年(2001年)已经45周年;今年也是它的创始人梁思成教授的100周年诞辰。

作为建筑史专家的梁先生,在20世纪30~50年代就发表过许多理论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是针对实际问题,比如关于“民族形式”的,关于北京规划的,关于古建筑保护的,都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更多的是就史论史,从历史事实(文献、实物)中阐释社会文化,或从社会文化角度阐释建筑现象,我认为,其理论价值更有深度。但1956年成立的这个研究室,却是学习前苏联的产物,因为前苏联建筑科学院就有一个建筑历史及理论研究所。不过,他们研究的理论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马列理论”,例如专门研究列宁的反映论与建筑形式等,与梁先生的理论思路全然不同。当时我所在的研究所也有一个理论研究室,但从来没有人正经写出过什么理论文章——“大批判”的除外。

我在这个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搞古建筑调查,参加编写建筑史。工作很饱满,但受批判也最多。我从批判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发现建筑历史的研究领域其实非常广阔,建筑历史并不枯燥,可以做出很有趣味的美文美画。研究建筑历史,可以从断代的、类型的、地域的、技术的、艺术的、典章的、生活的、思想的许多角度入手;也可以使用实物勘测,案头考证,重点分析,一般调查等种种方法。这本文集的第一部分“建筑历史”的文章,就是不拘一格从不同角度和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的例证。这些文章的深度有差别,但切入的角度和使用的方法,其价值是相同的。

许多有价值的理论都来源于对历史的总结,既然历史研究的领域很广阔,理论研究的课题自然也就很多。总体说来,理论研究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实用型的,它紧密联系实际,主要是对创作中的问题进行评论。而在评论时,最有力最实用的论证武器就是历史。以古鉴今,温故知新,并不是陈词套话。事实证明,理论的苍白正是由于历史的无知。另一类是思辩型的,它并不针对甚至有意避开某些实际问题,而从历史现象中归纳、演绎、抽象出某些条理,只要辩得深,说得对,就可以启迪实际工作者(例如建筑师)的心智,把他们的思维带入自由王国,把实际工作(例如建筑设计)做得更好。我对这后一种理论更感兴趣。尤其是建筑中的美学问题、文化特征等,都可以从史实中找出不少有益的结论。这就是文集第二部分“建筑理论”写作的初衷。

文集的第三部分是“文物建筑保护”。研究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结合,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毫无疑问,要把保护文物建筑与修缮破旧房屋区别开来的主要办法就是要加深对保护对象的深入了解,离开建筑史的研究是不行的。但是从文物保护的专业角度来说,只有建筑历史的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正确的保护理念。这就必须掌握明晰的认识逻辑,而认识逻辑只有通过历史逻辑的深刻理解才能获得,无论中国

外国概莫能外。文集中的这部分文章就着重在阐述保护的认识逻辑，而不是只讲保护对象的历史价值和保护的技术措施。

文集中最后一部分“杂论”，其实也可以分别归入历史和理论部分，不过究竟内容比较驳杂，体例比较自由，所以只好归入另类。

从1956年我进入“建筑历史理论”这个领域以来，40多年过去了，什么是建筑历史，什么是建筑理论，经过两代人的努力，也到了该交答卷的时候了。我的这本文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及格。如果能达到，就算是对新中国第一个建筑历史理论研究所和它的创始人梁思成教授的纪念吧。

本文集整理出版过程中承蒙诸多友情支援：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提供天宁寺塔、居庸关长城、湖广会馆测绘图；建设部建筑技术研究院历史所允许再次发表50年代的北京近代建筑照片；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及宣武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出资补助出版经费；韦然、赵德春为彩页摄影；老友于得祥先生特为本书题签，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2000年岁末记于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

目 录

建 筑 历 史

明堂形制初探	3
记汾阴后土祠庙像图碑	35
北京天宁寺塔三题	43
佛国宇宙的空间模式	63
塔的人情味	71
天然图画——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思想	78
雪泥鸿爪话宣南——北京宣武区史迹综述	111
承德外八庙的多民族建筑形式	140
承德古建筑群的中华民族建筑审美观	156
北京湖广会馆建筑	168
附：会馆与戏场杂考	180
房山大南峪别墅初勘记	193
中国近代建筑技术的发展	199
中国近代建筑的民族形式	216
中国近代历史的界标——对北京近代建筑的再认识	229

建 筑 理 论

环境艺术与建筑美学	241
建筑美学散论	266
中国建筑文化的机体构成与运动	277
中华民族的智慧与传统建筑的生命	284
民族形式再认识	289
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国传统建筑美学基础刍议	302
中国传统建筑审美三层次	323
中国建筑的审美价值与功能要素	336
建筑历史的科学价值——关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联想	349
形式的哲学——试析建筑文化	354
从怀旧中解脱——正确认识中国传统的城市美学思想	356

文 物 建 筑 保 护

保护文物建筑的可贵实践	363
保护文物古迹的新视角——简评澳大利亚《巴拉宪章》	373
为保存历史而保护文物——美国的文物保护理念	376
古迹整修中的建筑师意识——介绍斯里兰卡“文化三角”的古迹整修	385

援助斯里兰卡修缮古塔考察报告	396
苏州古塔维修研讨会综述	407
东峰古塔维修研讨会综述	412
司马台长城 西4台—东4台修缮工程总结	416
居庸关、云台修缮工程方案	436
生命在于创作——关于中国历史名城保护方针的论证	448
 杂 论	
“曹园”图说——南京江宁织造署与《红楼梦》荣国府	455
大观园与圆明园之关系	475
塞上明珠 古建精华——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	478
回首神州话古桥	486
说炕	497
重读列宁墓	504
历史界标与地方色彩——评梁思成著《中国建筑史》	507
于平实处见精奇——对刘致平先生学术风范的再认识	509
挺直脊梁做学问——为彭海《晋祠文物透视》作序	511
《理性与浪漫的交织》后记	514

建筑历史

明堂形制初探

建筑是有实用功能的物质产品，人们创造建筑，当然首先是为了要用得舒适。但是，中国建筑史的实例说明，人们花费在非实用的建筑或建筑的非实用方面的智慧和财富，却大大超过了生活实用的建筑或建筑的实用方面。《礼记·曲礼》说：“君子将营宫室（指房屋），宗庙为先，廡库为次，居室为后”^{〔1〕}。这里说的宗庙只是一个代表，宫殿的大部分，祠祀建筑，宗教建筑等等，即服务于精神方面的一切非生活实用的建筑都属于优先营建的范围。这样，建筑的精神功能便显著地被突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精神功能主要是审美功能，不仅在于取得观感上的愉悦，更重要的是要起到助人伦、敦教化，规范社会秩序，维护统治权威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始终贯穿着鲜明的社会性、政治性和伦理性。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形象创作中，特别重视它的社会内容，它的象征涵义和这些内容、涵义的表达力量。这一美学特征，或多或少或浓或淡地体现在大部分建筑中，明堂则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制 度 渊 源

（附图 I 明堂渊源）

明堂制度，是儒家聚讼千载的一个重要课题，常常是由帝王亲自主持，动员了最权威的学者们进行议论考证，但又往往不得要领。原因之一，就是它的渊源久远，涵义众多。

最早记述明堂制度的文献是《考工记》。该书据郭沫若考证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官书^{〔2〕}，设计明堂是“攻木之工”中“匠人”的职责^{〔3〕}。书中只讲明堂的建筑形式和尺度，没有涉及任何涵义。大体上相当或略晚于《考工记》的《礼记》中某些篇章，则对明堂的功能和涵义有了明确的记述：

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太庙，天子明堂。^{〔4〕}

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5〕}

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象紫宫，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总章象玉潢，北出玄堂象营室，东出青阳象天市。^{〔6〕}

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7〕}

这几条记述说明，春秋战国及这以前，明堂是天子召见诸侯颁布政令，并兼祭祀祖宗的场所，是一座礼仪兼祭祀的建筑，建筑形式有所象征。

首先要对《考工记》记述的明堂形式和尺度的文字作出明确的解释。文字不多，照录如下：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8〕}

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9〕}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10〕}

文字过于简约，且有脱衍。例如殷人重屋有修(南北进深)而无广(东西面阔)；周人明堂无阶；夏后氏世室无堂崇(高度)。又殷周皆不言建筑色彩，独夏后氏世室有“白盛”，郑玄注是“以蜃灰垩墙，所以饰成宫室”^{〔11〕}，实在太勉强，恐怕是衍文。又“四旁两夹窗白盛”，历来均断为“四旁两夹窗，白盛”，也嫌牵强，今断为“四旁，两夹”方可与上文“九阶”相连，而成为对建筑形式描述的统一语气。如是，则“窗”后面应是说明窗的形制的文字，方可与后文“门，堂三之二……”呼应。要之，从汉至清，不少学者对这些文字进行考据猜测，设想了不少方案，也提出了不少问题。比较趋于一致的方案是，主体建筑是一个十字轴对称的大房子，内部是“井”字形分隔。提出的问题则以隋代宇文恺的《明堂议表》最为关键：

三王之世，夏为最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为论，理恐不尔。^{〔12〕}

殷人重屋，南北(修)七寻，一寻八尺，共五十六尺；周人明堂，南北七筵，一筵九尺，共六十三尺；而夏后氏世室南北十四步(二七)，一步六尺，共八十四尺。按照建筑由简趋繁，由狭趋宽的规律，确实不合理。于是宇文恺说，“二七”中的“二”是“增益记文”，是“桑间俗儒，信情加减”。据他说他见到的古本，“并无‘二’字”，所以“堂修二七”乃是“堂修七”^{〔13〕}，七步四十二尺，三代中夏最早，尺度也最小，合乎情理。今按，宇文恺是杰出的建筑大师，他从建筑发展的趋势认为夏小于殷，殷小于周，这是正确的，但他说曾见到过“古书”则颇可疑。试问，从东汉以来，注经(包括《考工记》)儒生何止十数家，都不曾提到还有什么“古书”秘本，何得乃至隋代才突然出现？事实是他们错误地相信了夏朝确实有过一个《考工记》所描述那样的世室——明堂。须知，夏朝文化至今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夏朝建筑更是茫然得很。据考古资料，商朝的高级建筑，如偃师二里头遗址^{〔14〕}，黄陂盘龙城遗址^{〔15〕}，安阳小屯殷墟遗址^{〔16〕}，都是基座高不超过1米，进深大约10~13米左右的矩形房屋，大体上都符合《考工记》殷人重屋的尺度。周人明堂尺度略大于殷人重屋，完全可能是对实际遗物的描述。而所谓夏后氏世室，尺度最大，形制最完整，叙述最详细，说明它不过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一个理想方案，或者说是《考工记》作者的设计图，托名夏朝，不过是托古而言今。据此，可将这三种明堂的形式推测如下。

一、殷人重屋。只言进深(修)而不言面阔，就不应将周、“夏”制度硬套上去而设想成十字轴线对称的正方形形式。据上述三座商代高级建筑基址推断，重屋很可能也是一座矩形房屋。按商尺1尺等于0.169米计算，进深56尺约合9.5米，台高3尺约合50厘米。今选用二里头遗址的平面比例和柱网关系，可分隔成为一个扁长的“井”字形格局，中间“太室”依靠天窗采光通风，突出一个屋顶，是为“重屋”。

二、周人明堂。是由矩形房屋向正方形台榭过渡的中间形式。土台东西面阔九

筵共 81 尺，南北进深七筵共 63 尺，台高一筵 9 尺。台上五室，每室长宽均二筵 18 尺。历来的解释大都将五室放于台(堂)上。但日本人田中淡将中心太室放在堂上，其余四室放在堂下四侧^[17]则是一新解。今按，堂高九尺不过 1.7 米左右，势不可能安排房屋，故此解释尚可推敲。台上置五室，每室每面二筵即 18 尺，台四周各留半筵即 4.5 尺。这个尺寸是为了保证台上的室柱有足够的承压角度，即“下出”的部位。东西(面阔)方向太室两侧各留一筵即 9 尺的通道。这两条通道一是五室间交通所需，二是屋檐排水所需，三是按文献所叙周代建筑通例，设东西阶的位置所需。

三、所谓夏后氏世室。应是一座标准的台榭建筑，中心、四隅为土台，四面两层，十字轴线对称。下层为堂，上层为室。“堂修二七”，指下层东西、南北各有二堂，每堂进深七步，二堂即二七共 14 步；“广四修一”，指面阔(广)是进深(修)的四倍。从任何一个正面看，通面阔都有两个堂的进深(14 步)和一个堂的面阔(也是 14 步)，总共 28 步，即一个堂的进深(修)的四倍。但一个堂的面阔中有一部分由于土台结构和“夹”各占去一步，所以实际为 12 步，每堂三间，每间 4 步，是为“三四步”。上层太室与下面的堂的间架尺寸对应，每面三间，每间 4 步，也是“三四步”。“四旁”，指台上太室四面的敞坪，也就是下层堂的平屋顶。按：“旁”通侧，通外，所以应是一种建筑的具体位置。“两夹”，应指在东西两堂的后面各有一夹室，其宽度各为 1 步。此种设夹室的布局方式，以后尚见于西汉长安明堂辟雍和东汉洛阳灵台(只有一夹)，可能是储放神主的密室，也可能是从内部升台的楼梯部位。四隅土台上各建四小室，每面各留“下出”三尺，是为“四三尺”。东、西、北各二阶，南面三阶，是为“九阶”。下层堂每堂二门一窗，上层室每面一门二窗，是为“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白霤”，实不明白是何意思。

这种十字轴线对称，“井”字形分隔，相邻为九，间隔为五的空间模式，由于它的形式美的特征，便附会出了许多礼制祠祀的内容。蔡邕《明堂论》说：“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环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实，其实一也”^[18]。这个模式所容纳的涵义，是极为广泛而神圣的。《白虎通》说：“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19]。五室对称，正向四堂，堂分三间(一“庙”二“个”)，于是明堂之中可以包含四向、四庙、四堂、四学、五方、五帝、五神、五德、五材、五色、五音、五味、五臭、五虫、五脏、五谷、五肉，以及十二月、十二律、十二居所等等名目^[20]。总之，它已经成了天上地下，宇宙万物，和谐折衷，运行不息的象征了。

然而何以命名为“明”堂，还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明”的涵义是“明政教”^[21]，“明诸侯尊卑”^[22]，明堂是明辨方位，明辨政事，明辨时序，明辨等级的场所，含有伦理的、历史的意义。另一种“明”的涵义是“取其向明”^[23]，“垣高无蔽日之照”^[24]，明堂是周围通透，四向八达，外向对称，明朗开敞的建筑物，含有审美的、空间的意义。这种时空交汇的审美观念，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建筑观念里，已经有了萌芽，明堂形制的渊源，也应当追溯到那时。

《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